

“比较”经典译丛

● 主编 / 孙宽平

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

Transition,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比较”经典译丛

转轨、规制与 制度选择

Transition,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主编 孙宽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

“比较”经典译丛

主 编 / 孙宽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65232637
责任编辑 / 章绍武
责任校对 / 枣 栗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3
字 数 / 321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223-8 / F·099
定 价 / 2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编译局主管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组织机构

主 编 吴敬琏 荣敬本 赵人伟

社 长 杨金海

执行主编 孙宽平

副 主 编 杨雪冬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顾锦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 灿	许成钢	李剑阁	张卓元	陆学艺	杜书明	吴晓灵
吴敬琏	胡建森	洪银兴	周小川	周叔莲	赵人伟	郭树清
逢锦聚	荣敬本	徐显明	唐万里	黄建柏	黄范章	程 伟
楼继伟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建堂	王水林	史晋川	吕 炜	吕晓波	迟福林	刘成相
苏 波	李 克	李晓西	张少春	张 新	邹农俭	范恒山
易 纲	林毅夫	周其仁	周茂荣	信春鹰	侯云春	胡鞍钢
姚 刚	俞可平	郭励弘	贾 康	钱颖一	袁纯清	夏 斌
崔之元	黄海洲	谢 平	谢 庚			

编辑部主任 曹荣湘

编 辑 丁开杰 李 连 马玉茹

总 序

荣敬本

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发表的翻译文章以专题形式结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正式公开出版以前，吴敬琏、赵人伟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曾编辑出版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收集了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人的著作。布鲁斯、奥塔·锡克在 1979 年底和 1981 年先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邀请来华讲学，他们都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其中锡克任捷克副总理时主持的经济改革，被说成“布拉格之春”，遭到苏军坦克的镇压。布鲁斯、锡克的讲演，在经济学界和最高决策层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也有不同意见，其根源还是把市场经济同姓资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有意识地选编了国际上已流行的不再强调“主义”比较法，而强调决策、信息、动力的“体制”比较法，也选编了前苏联批评“市场社会主义”，把它等同于反苏、反共的材料，供大家比较参考。该书临出版前，吴敬琏教授还推荐了一篇科尔奈论短缺经济学的文章（这可能是国内较早发表的一篇科尔奈的文章）。这样，就形成了一本论述不同于前苏联的集中计划体制模式的论著。

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编辑出版过程中，国内正好处于学习高潮，赵人伟教授已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董辅

初教授、吴敬琏教授和我则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英语强化训练班。在学校里，我们完全像大学生一样学习。此后，吴敬琏教授还曾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发行量有一万多册，成为许多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这种学习对推动中国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敬琏、赵人伟教授已先后从国外学习归来，这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对改革取向的选择，而是如何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鉴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编辑出版的成功，在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合作编辑出版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一刊物。刊物取名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还有一段小故事需要交待。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初教授从德国访问回来后，曾送给我一本书，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所谓经济社会体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政治体制，三是文化体制，即有关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文化理念。刊物名称即由此而来。刊物的名称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刊物发行初期，发表了吴敬琏、赵人伟在出国学习期间收集的比较经济学的最新文献，以及他们在国外结交的许多学者的文章，成为了很好的学习课堂。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我们刊物出版以后第一次编选的文集《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当时，针对官倒和腐败风气蔓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在体制转轨时很容易发生利用行政权力谋取金钱的现象，这是典型的寻

租行为，是产生腐败的温床。针对这种现象，吴敬琏教授倡议我们刊物召开一次有关寻租理论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受到经济界的好评，林毅夫等推荐了有关寻租的文章，钱颖一还对译文做了校对，还有邹说教授的博士生曹景钧送给我们一本关于寻租的论文集。这样，我们在杂志上不断刊载有关寻租的文章，最后，由肖梦负责，把有关文章结集出版。这本文集多次再版，影响较大。

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不仅使我们更坚定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而且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开拓了新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时，使我们更注意研究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更注意研究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时的制度建设，刊载了大量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最新理论文献和研究成果。

此外，亚洲经济发展一直是我们的刊物关注的重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始终存在着依存关系，特别是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如何看待亚洲发展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并且关注我们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刊载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章。

我们的杂志从创办起就意识到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创新，但是，也要注意各个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选择的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注意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社会共同繁荣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杂志也刊载了许多文章和资料。此外，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方面，以及在企业治理方面，我们也刊载了许多文献和资料。

早在刊物创办时，我们就提出了四句话作为刊头语，即“比较开眼界、比较长知识、比较启智慧、比较出真理”。值此我刊出版逾百期之际，回顾我们改革的历程，许多改革方面的创新都是集体学习、集体实践的结果。中央编译局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的翻译机构，我们深深懂得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理论创新。我们编辑此文集的目的，就是为这种集体学习和集体实践提供方便，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

2003年7月于北京

导读：制度经济学及其在改革中的 实践与发展

孙宽平

《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是我们杂志社从近几年来刊载文章中选编的系列译丛中的一册，正如书名所表明的，本书侧重于制度经济学和规制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体制比较与制度分析，是作为分析我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体制选择的学术方法引入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改革理论界就初步认识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控制模式向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转轨，是一个远比我们在改革初期所能想到的更为复杂的转轨过程和改革过程，而且发现，改革过程、改革措施的选择以及改革方向的确定，都与原有的体制基础和社会、文化、经济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与一定社会文化经济传统相联系的社会运行系统。在改革中，当我们重新反思中国传统体制的弊端以及重新思考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的问题，从比较中发现体制传统和制度禀赋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为了寻找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体制比较和制度分析才引入到中国改革理论中来，而且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主要方法。

体制比较和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引入到中国，更为直

接的是要通过国别的比较和不同体制的比较，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一个体制转轨过程，也是更为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既要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行政控制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后一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成功实现体制转轨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既没有成功的经验，也没有可以参照的模式，所以需要通过比较寻找我国自己的改革模式和转轨模式。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过程，这个“石头”一方面来自我国自己在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要来自别国的实践经验，而对别国的经验最好的借鉴方式莫过于比较。体制比较是案例的比较分析，更多是一种政策性和具体措施的研究，而制度分析则是对中国改革深层次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所援引的规范的分析方法，即力图从制度结构的层面回答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提供一种分析方法。正如本书第一篇文章——《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中诺斯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因此可以说，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则是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改革理论中，以便为改革理论提供新的分析方法和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改革过程，分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

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方法进入中国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也与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的认识与研究有直接关系。战后，东亚的日本首先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突破了国际经济传统格局，在国际格局中占到一席之地。随后，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先后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西方基督教文化

传统之外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新的发展模式。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围中，相当长时期以来一直认为，囿于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可能突破自身传统束缚成功实现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良好的经济和发展势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试图从另一类经验中寻找答案，而这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成功发展经验也为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提供了良好的案例。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更为直接的意义在于，同处于一种文化传统范围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能够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经济成功和社会发展，其中的奥秘在何处？世界银行 1993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以及随后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了题为《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论文集以后，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这些讨论对当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选择的我国来说，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

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作为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给“制度”这个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术语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赋予了全新的作用，它不仅是问题认识和问题分析的“对象”，也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和一种“视角”。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并不仅仅是法律规定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和行政运行的制度设置这些“硬性”的正式组织框架和制度框架，而且也包括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交易秩序和文化传统，与这种交易行为相联系的认知模式，以及基于这种认知模式而形成的行为规范、规则、准则、约束条件等“软性”的非正式制度。用青木昌彦的话来说，制度就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同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①

^① 见青木昌彦著，周黎安翻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 页。

同时,根据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制度”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多个参与主体之间博弈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以及由这种均衡状态实现的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即“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因而制度必然内生于一定的“域”之中,它通过自身概要表征——隐性的或符号的——协调着参与博弈主体的信念,制度作为一种均衡现象,与纳什均衡具有同样的表现,即只要在给定的条件下,任何参与主体都要在各自都设定的一种“框架”内活动,参与主体基于共有的信念和认知信息而做出策略决策共同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均衡再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概要表征。这样,制度成为一种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主体视为当然的设定的前提条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制度虽然是内生的,但同时又客观化或外化为一种约束,即我们通常所能感受到和认知的明确的、条文化的以及符号的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者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因此,从均衡的概要表征特点来看,制度具有既制约又协助的双重性质,制度通过协调参与主体的信念控制着参与博弈过程的所有主体的行动决策规则和行为规则,但是由于制度已经是一种给定的“框架”,并内化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则,甚至成为价值判断的基本准则,因此,制度又是内生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制度在一个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可以帮助理性有限和信息有限的参与主体节约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加工成本和交易成本。

从均衡的基点出发,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为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提供了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制度”作为分析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范畴,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把“制度”看做是通过多方参与主体博弈过程“内生”形成的。根据制度比较理论,作为内生的博弈规则的“制度”,并不

是处于“经济域”之外的外在的东西，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因素，也就是说制度既起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的条件，也是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约束条件。因此，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使改革理论认识到，作为改革目标确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作为内生因素才能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否则，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或者力图把市场经济体制嫁接到传统的体制上，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经常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制度发展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理想”的计划或设计需要与现存制度环境“耦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制度机制。制度一旦确立就具有其“外在”的规定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认为“历史是重要的”。

从均衡和内生理理论出发，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给予改革以全新的解释。在制度分析理论看来，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转变过程。因为，在浓缩信息的指引下，参与主体开发出与博弈内生规则相一致的技能和倾向，并因此形成了一种行为规则和规范以及相应的认知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均衡状态，也就是制度安排。但是，或因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因为参与主体的变化，原参与主体业已形成的技能和决策习惯以及认知模式同时出现问题，以致打破均衡状态，从而引发“制度危机”。新制度的出现只有当参与主体的决策规则在新的条件下相互一致，其概要特征导致的各人的信念系统相互趋同时才能形成。这种转型并不仅仅是在给定的博弈结构下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过渡，也包括由参与主体一定的决策规则集合下的均衡向其他（或扩展）决策规则集合下的均衡过渡。在过渡过程中，包含新行动选择的各种决策规则被参与主体不断尝试并相互竞争。因此，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通过不断竞争的转型过程。

本书第一部分就是通过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青木昌彦等《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和《比较制度分析：起因和一些初步的结论》，阿弗纳·格雷夫《后中世纪热那亚自我强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等几篇文章，力图使读者对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的基本构架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本书第二部分是结合规制的案例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理解。约·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一文结合对市场和社会社会主义六个问题的“神化”（神话）的批判，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中突出地强调了改革过程中建立规则（或制度）的重要性。罗曼·弗里德曼等合写的《约束的界限：转轨经济学中的所有权和硬预算约束》一文，则是从所有权和预算约束方面，强调了从传统的行政计划控制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约束是提高传统国有企业经营绩效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但是这些外部约束还需要通过所有权的改革建立起“硬”的预算约束机制，才能达到其所期望的效益目标。B. 列维和P. 斯皮列尔《规制、制度和承诺：电信比较研究》一文，通过牙买加、英国、智利、阿根廷和菲律宾等国电信行业的改革和规制变化的案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把规制看做是契约问题的微观方法，分析了公用设施的规制问题，深入探讨了电信业民营化（私有化）改革在不同政治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下的经营绩效。《阿根廷：电信私有化及其规制的后果》和罗杰·G. 诺尔《发展中国家的电信业改革》两篇文章可以与前一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主要是从阿根廷的社会政治制度变化与电信业私有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探讨制度变迁路径，以及政治社会环境对“制度”（或规制）确立的影响作用。E. 格莱泽的《科斯对科斯定理——波兰与捷克证券市场监管的比较》，张新和陈轲钊的

《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与信用制度的重建——兼谈安然事件对新兴证券市场诚信制度构建的启发》两篇文章，则是从市场经济转轨国家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两种类型的证券市场规制演变案例分析中，探讨了法律制度及政府规制改革问题，在某种程度可以作为上一部分制度变迁过程理论的具体印证或案例诠释来阅读。

第三部分是从政府的角度探索制度变迁的理论问题。在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中，政府或者公共政策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制度分析理论把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域”中的一个参与主体，政府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动机和抱负的个人组成的组织，在“政治域”的博弈中，政府是一个内生的参与主体，任何政策制定的结果可以被理解为由政府、政治家、私人等参与主体互动决定的。在安妮·O. 克鲁格等人的《管制的政治经济学：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性》一文中，作者认为，当政治决策层试图控制经济活动时，管制的复杂性就会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已经是一种有规律的经验现象，在这种复杂性不断累积增加的情况下，会导致政治决策管理出现多种重要结果，有些可能是超出政治决策层能够控制和影响的非预期性负面结果。这一点从前共产主义计划体制的复杂性增加所导致的国家无效率不断增长的事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作者认为，同样在改革过程中，控制和管制的大量增加，会造成沉重的社会成本，许多改革国家改革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层，在改革过程中面对各种社会危机局面时，力图增加政府的管制和控制以达到改革的目标，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改革所导致的制度解体就是这样的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通行的理解，“管制”似应译为“规制”更合适一些。乔尔·赫尔曼等人的《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腐败与政府被控——转型国家中企业与政府交易关系研究》一文则从具

体的案例调查数据，说明了政府干预越多，越会造成政府腐败和政府自身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的局面，从而导致政策改革的低效或失败。托尼·赛奇《中国改革中变化的政府角色》和维托·坦茨的《体制转轨和政府角色的改变》两篇文章，以转轨过程中政府角色变化的具体情况，认为一个有效而不是强大的政府结构是成功的改革有望实现的前提条件，否则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指导市场转轨进程，则会导致市场化改革中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使改革目标难以有效实现。作者指出，中国改革进程中政府进一步改革的领域，应该从太多的产业政策中退出来，而通过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以便保证农村和社会急需且必要的公共服务。大野健一的《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90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和青木昌彦等人的《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新诠释：市场增进论》两篇文章，从日本的经验和东亚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角度，用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方法论证了政府的作用，对东亚经济发展原因做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作者认为，在东亚经济发展进程中以及类似于东亚国家特点的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政府既不能做一个无所作为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守门人”，也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管理者”，既不能充当市场的“亲善者”，也不能充当经济发展的惟一的“推动者”，而是要通过制度的互补来发挥对市场的增进作用。作为市场增进者角色的政府，其作用点和着力点在于促进和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把政府和市场看做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或者是在各自领域中独立发挥作用的两个主体，或者是简单地校正对方失灵的独立主体。作者认为，把政府作用确定在增进市场上，所强调的是，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的互补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民间部门（市场主体）通过激励机制和处理信息的比较优势，发挥其市场作用，而政府政策则主要在于通过弥补民间部门

(市场部门)解决协调问题能力和克服其他市场缺陷能力的不足,从而使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这一理论出发,作者认为,政府应被视为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的参与者,政府代表一整套的协调连贯的机制,而不是附着于经济体系之上的、负责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

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尽管它还有待于转轨国家改革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但是,这一理论仍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随着转轨国家改革实践的推进,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将会给诸多问题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从而使我们能够从多角度审视改革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既是对前几年我们杂志刊载这一研究领域文章的选编,也是为关心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重新审视这一学科发展过程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为推进这一领域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期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刊载在我们杂志上,为我们以后的选编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这些文章的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关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才会受到作者的厚爱和支持,正是他们的思想学术精华激发了我们更多更深的思考;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这些文章的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通过他们传神的译笔,使我们能够领略到这些学者思想的深邃和睿智以及他们对中国改革的关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译者生花的语言,使我们能够与这些学者沟通交流,并因此激发了中国本土学者的思想火花。当然,更需要感谢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诸位编辑,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散乱在我们杂志上的学术精品以一个全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他们精心的版式设计和印制,使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整体,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制度分析和体制比较理论的学术构架和基本思想脉络,从而为我国